

论刘少奇的和平经济竞争战略

熊启珍

摘要: 和平的经济竞争是刘少奇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提出来的,是他本人革命转变战略——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它的中心,是用经济的办法而不用行政的办法,通过市场竞争,解决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一设想中,刘少奇提出了许多非常有创造性的思想。这一设想是对毛泽东和平的革命转变战略总构想的重要补充。它对于革命的转变和新中国的建设,乃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刘少奇 和平的经济竞争 战略

1948 年,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研究未来新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刘少奇从中国的经济状态入手,分析了新中国各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战略设想。

所谓和平的经济竞争,其核心,就是在新民主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用商业的方法”——竞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刘少奇分析了竞争的对象、内容、范围、环境和对象等各方面,阐述了他关于和平的经济竞争的主要设想。

和平的经济竞争的主要对手是普通的非投机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于国于民有利的部分,不仅会在一定时期存在,并且还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由国家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成为竞争对手。刘少奇在阐述党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一方面,应该采取严厉的办法禁止一切公私机关及个人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同时,允许并在适当的范围内帮助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之发展。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又须逐步地适当地和它进行一种和平的经济竞争。”

竞争的主要内容是经营管理。刘少奇认为,和平的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杠杆,而是通过经营决出高下。他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即“是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这是刘少奇和平的经济竞争这一设想的基本点。当时,由于党在整体上还缺乏经济工作经验,党的干部还不善于经济工作,因而,一些国营公司、企业在原料、市场、价格等方面往往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运用行政手段,挤私人企业。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统制原料、市场,这是普通生意人的办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他要求国营公司、企业要主动与资本家合作,同资本家协商。否则,“必定公私都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

竞争的范围是市场。刘少奇认为竞争贯穿在各方面,主要领域是市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因此,刘少奇强调:国营经济要加强管理,尤其要严密地组织国家商业,以适应这种和平的经济竞争。刘少奇设想在新民主

主义时期,国营经济要在计划指导下进行生产,但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市场,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市场这个大舞台上竞争。国家商业是国营经济在市场中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竞争的代表。因此,刘少奇提出要严密地组织国家商业,保证国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力量,以最终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在竞争中战胜资本主义经济。

竞争应该是公平有序的。刘少奇多次强调竞争“是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这表明,刘少奇设想的是各类经济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即有序的市场竞争。这也是他对于一些国营公司、企业在原料、市场、价格等方面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依靠行政手段,挤私人企业的行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主要原因。他提出采取严厉的办法禁止一切公私机关及个人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也是由此出发的。

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小生产者。刘少奇认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经济竞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因此,他提出,我们的任务就在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在长时期内帮助、教育和组织他们,使他们跟随无产阶级逐步地前进。用什么办法使他们跟随无产阶级逐步地前进呢?刘少奇反对用行政手段。他说:“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采用这种行政手段,将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刘少奇指出,只能用经济的办法使他们富裕起来,才能团结他们,领导他们。他说:“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否则,领导权仍不能巩固。”所谓经济的办法,就是供销合作社。刘少奇认为这种合作社“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的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是在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中“起着决定作用的”^①,“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和投机商人及旧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和平竞争时一个组织好了的伟大的和可靠的经济同盟军。没有这个同盟军,或者不把这个可能的同盟军组织好,国家经济在竞争中是不可避免地要失败的”^②。因此,刘少奇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去组织合作社。

刘少奇认为和平的经济竞争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战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方法。他说:“我们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投机资本可以采取加以禁止,而对于旧式的资本主义成分则不能这样,必须在和平的合法

的经济竞争中证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之时,旧资本主义才会让位于新民主主义。⁴²

和平的经济竞争将持续多长时间呢?什么时候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呢?刘少奇认为,“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⁴³。这就是说,和平经济竞争持续的时间以中国经济这个客观事物的发展程度——工业生产过剩为标准。当时估计这大约需要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

总之,刘少奇设想,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国营经济与由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的全国范围的合作社经济,结成牢固的同盟,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和平的、长期(15年或更长一点)的经济竞争;在竞争中逐步壮大国营经济直至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实现和平转变。

二

刘少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平的经济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既只能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也存在着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条件。

第一,和平的经济竞争是由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决定的。刘少奇认为中国的经济落后尤其是大工业落后,决定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能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保留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使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1948年9月他在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时指出:大工业虽是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但是在数量上是比较很小的一部分……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刘少奇说:“因为这样做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将来全世界都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这要在可能与必要条件下才消灭。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⁴⁴

第二,和平的经济竞争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这个主要矛盾的表现。刘少奇分析了即将在全国范围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后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一般地处于对立地位的,私人资本主义要同它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⁴⁵一方面,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而且,“资产阶级在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将来还要用一切方法与国营经济实行竞争,盗窃国库(国家的每个工厂和企业都是国库),并将努力地使国营经济服从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则将努力地使国营经济服务于全体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⁴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经济竞争就是这个矛盾的表现。当然,“这种竞争,首先是和平的经济竞争。”⁴⁷因为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我们也无需推翻,再进行一次流血革命。

第三,和平的经济竞争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决定的。刘少奇多次强调,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中求得社会主义的前途,便成为两难选择。“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来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刘少奇认为只能实行“和平的经济竞争。”在和平的经济竞争中即使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又使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取得优势,从而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总之,在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不可避免的条件下,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便是正确的、明智的选择。

刘少奇认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在和平的经济竞争中具备有利条件,这就是:

第一,无产阶级的团结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高度的政治觉悟,以及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早已巩固起来的对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权。第二,在土地革命中巩固起来的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团结,以及无产阶级经过国家形式对于农民忠诚而有效的帮助、教育和领导。第三,大的工业、矿山、运输业和银行、对外贸易等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手中。国家并可经过合作社这一个伟大的经济系统,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和其他劳动人民组织起来,站在自己方面。第四,国际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有力援助。

当然,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中国的大工业还很少,大量的产品,特别是能供给市场的商品,还操纵在私人资本家、富农及小生产者手中,这就造成商业投机及旧资本主义成分发展的有利条件;在社会上,存在着极为广大的小生产,这些小生产具有极大的社会势力,他们的向背可以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败;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暂时还缺少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还不善于和投机商人及旧资本主义成分作经济上的竞争,而投机商人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则有更多的经验;国际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影响。

三

显然,能否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是能否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关键。刘少奇强调:我们要善于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

第一,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刘少奇强调通过经济竞争实现和平转变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他说: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如果糊涂盲目,犯重大错误,那就要失败⁴⁸。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是要认清斗争的性质及其前途。刘少奇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还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和平转变,今天还只是极大的可能性,并未最后确定,并没有解决”⁴⁹。到底谁胜谁负,“这是要看将来的发展情况才能决定的。”⁵⁰刘少奇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竞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政权也可能变,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命。⁵¹总之,“这个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新中国的性质。如果我们对这点不觉悟,在方针上犯了错误,是危险的。”⁵²

第二,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反对盲目和急躁两种倾向。刘少奇强调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团结各种力量共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⁵³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⁵⁴因此,“这些发展必须是有轻有重,有大有小,而不能是平等看待及平均发展的”⁵⁵。对于国家经济,“要使其依照新民主主义的正确路线,而不是依照官僚资本主义或旧民主主义的错误路线首先得到发展。”对于合作社经济,“我们要用一切可能的和适当的方法使其依照新民主主义的路线获得发展,并使其在社会经济构成中占有极广泛而稳固的地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允许并在适当范围内帮助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之发展。”⁵⁶“至于广大的小生产,则更加需要发展。”⁵⁷刘少奇强调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与经济计划和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允许有任何模糊和混乱。因此,刘少奇提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

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⁴⁸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⁴⁹这就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⁵⁰。

第三,必须学会经济工作,善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和平的经济竞争。刘少奇反复强调:必须学会经营。他说:我们还缺少管理的经验,还不善于和投机商人及旧资本主义成分作经济上的竞争。“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大的努力,不学会经营无论如何不行。”⁴⁹刘少奇多次批评国营经济不善于经营。他说:“在目前来说,我们整个的国家工业,平均利润是低的,赶不上私人办的工厂,还不如私人办得好。”⁴⁹有不少的经济单位是经营和管理得很坏的,以至经常赔本。因此,刘少奇提出,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学习并获得科学的管理经验,学会文明地经商。他强调:如果“我们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快要失败,无产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权就要被推翻。”反之,如果我们“善于经营管理经济,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能胜利,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能一直发展下去。”⁴⁰

四

和平的经济竞争战略,包含许多非常有创造性的思想。它不论是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建设,包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和平的经济竞争是对毛泽东和平转变战略的重要补充。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经过新民主主义和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但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刘少奇提出的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设想在总体上与当时毛泽东的和平转变战略是一致的。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称赞刘少奇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时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还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⁴²并且,在刘少奇讲话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插话补充:“斗争形式有两种,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⁴³单讲与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⁴³可见,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正因此,刘少奇这一设想中的基本想法为毛泽东所吸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战略的一部分。

第二,和平的经济竞争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确的战略选择,它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革命转变这个两难问题。这一战略是在充分正确地分析估量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的经济落后,决定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成为首要的任务。而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又要求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在两种具有对立性质经济的必然的竞争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平的经济竞争就是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基于两种具有对立性质的经济竞争的客观必然性,并着眼于社会主义这个发展方向而作出的战略选择。如前所述,和平的经济竞争反对用行政手段解决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主张在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充分发挥国营经济自身的优势,最后战胜资本主义。显然,这既十分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又能充分保证它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过15年或更长一点时

间的和平的经济竞争,一方面将有力地促进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也将获得显著的增长和提高,充分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这样,既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近代以来长时期困扰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又使社会主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新中国建立时正是依照刘少奇的这一战略设想来考虑、部署、安排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尤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显著增长,证明这一战略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和平的经济竞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和平的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用经济的办法解决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点是“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经济竞争是这一战略的主要环节,经营管理的质量与水平是各类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其他各种经济发展的杠杆。它存优汰劣的规则将迫使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推动各种经济改善经营管理,注重质量和效益,依靠高质量的经营管理求得生存与发展。这样的竞争,最终将促进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促使还不善于经营的国营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提高质量与水平。毫无疑问,和平的经济竞争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对于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都是一剂良药。

第四,它隐含着一个极富创造性的经济体制模式。刘少奇是从市场经济这一法则出发设计这一战略的。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社会主义前途的发展战略。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刘少奇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设想用和平的经济竞争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和社会主义前途这两大问题。按照这一设想,市场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机制。当然,刘少奇也设想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将逐步实行计划经济。但,一方面,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是在转入社会主义之后;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纳入计划范围的仅是国营经济,并且,按计划运行的国营经济仍将在市场中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展开竞争。刘少奇强调指出:“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内的计划经济。”⁴⁴如前所述,刘少奇还设想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中,用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按照市场规则,参与竞争。这也就是说,刘少奇设想的这一战略的经济运行模式是计划与市场并存,以市场为主。显然,这既不同于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当时资本主义的纯粹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中国情况设计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模式。

笔者以为,上述2、3、4各点,既是刘少奇这一战略设想中最具特色的,也是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启发的思想。

注释:

¹⁰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3 34 见《刘少奇论新中国建设》,10~11、51、97~98、85、55、5、33、5~6、10、16、27、15、104、48、29、29~30、15、7、5、15、4~5、46、79、146、13、10、14、148~149、51、120、15、5~6、3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³² 《毛泽东文集》,第5卷,145~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Q)